

托马斯·卡莱尔研究综述

童少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托马斯·卡莱尔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都影响甚巨, 引起了种种思考和争议。相对于西方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卡莱尔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 尤其对他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托马斯·卡莱尔; 研究; 综述

作为十九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托马斯·卡莱尔一生涉猎颇丰, 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西方社会, 托马斯·卡莱尔始终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但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因此而受到置疑, 他复杂的思想体系为后世的追随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无尽的资源。西方学界对卡莱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记、评论集和研究著作三个方面。

在传记方面, 最著名的莫过于J·A·Froude写作的四卷本传记, 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记述了卡莱尔一生的前后两个阶段。身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卡莱尔最亲近的学生, Froude在卡莱尔研究方面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他的传记是研究卡莱尔的必不可缺的资料。另外, 有关卡莱尔的单卷本传记可谓汗牛充栋。Richard Garnett的《托马斯·卡莱尔的生平》是一部成书较早的传记, 其中包括一个批评章节, 总结了卡莱尔的哲学思想与成就, 认为他“将会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而受到后世的敬仰, 而不是以他作为文学艺术家的地位”。John Nichol的卡莱尔传记是John Morley所编《英国文学家》丛书中的一本, 以卡莱尔的文学生涯为记述角度和线索。G.K.Chesterton的传记篇幅短小, 且带有较浓厚的批评色彩, 肯定了卡莱尔的非理性思想, 同时对他一以贯之的讽刺笔调提出了批评。A·L·勒·凯内的《卡莱尔》从预言家的身份定位出发, 追述了卡莱尔的生平与成就, 观点独具一格, 影响很大。

至于评论集, 则以J·P·Seigel编纂的《托马斯·卡莱尔: 批评的遗产》(Thomas Carlyle: The Critical Heritage)最为权威和完整, 几乎涵盖了从卡莱尔1834—1881之间全部著作的评论文章。美国Gale Research Co.出版的文学评论丛书《十九世纪文学评论》收录了1800—1899年间逝世的作家, 其中包括卡莱尔的专卷, 收录了上述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部分西方学者对卡莱尔的评论文章, 评论对象主要是卡莱尔中后期的作品, 该卷书对了解卡莱尔在不同时代的影响和接受有着很大的助益。但是, 这两部评论集对卡莱尔的早期作品显然不够重视。

关于卡莱尔的评论著作或以专著的形式出现, 或见于一些著作的章节中。值得注意的是, 卡莱尔作为文学家的成就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William Savage Johnson的《托马斯·卡莱尔: 对一个文学见习者的研究》截取了卡莱尔1814—1831的生活片段, 专门论述了他早期文学思想的积淀过程, 并以《拼凑的裁缝》作为他成功踏上文学生涯成熟期的标志。F·W·Roe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托马斯·卡莱尔》是研究卡莱尔文学思想的一本专著, 分别从横向和纵向考察了卡莱尔与其时文学环境的关系和他文学思想的形成转变过程, 较为全面。Charles Frederick Harrold的《卡莱尔与德国思想》是一部关于卡莱尔如何接受德国文学和哲学影响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雷纳·韦勒克也在其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卷三中

开辟专章阐述了卡莱尔的文学批评观。总的来说, 他对后者是持批评态度的, 作为推崇文本独立价值的新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 对卡莱尔“以德取人”、以人论文的批评原则表示不满, 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但他同时充分肯定了卡莱尔在批评史上的价值, “作为文学批评家, 德国文学解说者, 历史主义及超验主义的阐发者, 卡莱尔却具有重要意义”。A·Abbott Ikeler的《清教气质与先验信仰: 卡莱尔的文学观》集中论述卡莱尔文学观的形成过程, 剖析了这一过程中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矛盾与融合。

另外一些研究立足于卡莱尔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成就上。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将卡莱尔置于十九世纪的思想大框架中进行考察, 指出了他作为文化批判者的意义, 这一研究视角对我国学者产生了影响。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文学》中阐述了卡莱尔历史学思想的变化轨迹, 并批判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偏执看法。

由于卡莱尔后期的英雄崇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 后世对他的态度总是充满了矛盾, 西方学界对他的研究也曾处于时冷时热的状态。但时至今日, 在人们对二战的反思日趋深入之际, 重新全面地评价这位十九世纪的思想巨人, 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举动。

相对于国外学界的研究情况, 国内的卡莱尔研究则薄弱不少, 较为全面、深入、客观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尚无一本研究专著, 作品翻译也十分缺乏。这些研究成果突出反映了国内学界对卡莱尔历史思想的研究态度的转变。

卡莱尔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 尽管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专门性的历史学家, 他的《法国大革命》《英雄和英雄崇拜》《克伦威尔传》《腓特烈大帝传》等, 都是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作品。然而长期以来, 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 对卡莱尔历史思想的研究陷入了停滞和“一边倒”的局面, 人们往往把他的英雄史观作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历史思想加以一味的批判。这种局面直到近二十多年来才得到改观, 学界出现了一系列“重评”之作, 包括张广智教授的《重评托马斯·卡莱尔的史学思想》和山东大学宋新影的硕士论文《重评托马斯·卡莱尔的历史思想》, 后者以《英雄和英雄崇拜》为界, 将卡莱尔的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肯定了它的社会和历史价值, 也提出了它的不足之处, 却已经脱离了关于“唯心”“唯物”的争辩, 而是从历史学角度进行批评, 并指出其历史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联。陈文海的《激扬华章下的恒流与变异——关于卡莱尔及其历史观念》对卡莱尔进行了颇有新意的考察, 他从历史本体论角度出发, 认为卡莱尔笔下的“英雄”并不是历史的“原动力”, 而只是“‘原动力’支配下的‘传动者’”, 呈现出“上帝——英雄——群众”的逻辑关系, 因而驳斥了那种将其英雄史观简单地视为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的观点; 同时又提出“人治”是卡

(下转051页下)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神圣的爱”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走向,冉阿让是在仁慈的米里哀主教感化下才由盗贼成为善良的圣徒,怙恶不悛的沙威警探则被冉阿让施善他人的德行感化最终畏罪跳河。雨果通过这种“神圣的爱”告诫世人,当法律本身不符合“绝对的人道主义”之时,法律带给人的就只是强制,而爱与宽容却能够避开法律式的镇压,获得重生。同样,贯穿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创作中“忏悔贵族”形象的塑造和“忏悔与宽恕”主题的表达均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长篇小说《复活》中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和农奴少女玛丝洛娃在托尔斯泰所限定的拯救人类的宗教道德这一药方中完成了“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诱惑—堕落—救赎),小说中大量幻想式的宗教说教超越了作家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则一再宣扬这位革命战斗主义艺术家“宗教忍耐”和“受苦赎罪”的基督教教义。

故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作家要把人文精神揉入基督教义中,就如同大文豪巴尔扎克所言,“基督教,……既然是压制人类恶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因此它也是稳定社会秩序的最大的因素。”

三、独具风格的教会节日、活动等,成为文学传唱最有效的方式

回望西方文学史,中世纪是一个神学统治的时代,世界三大宗教在此形成并广泛传播,教会文化以其强大的实力主导文坛,宗教的权威规范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历史的变迁。12世纪基督教规定了宗教的七种仪式:洗礼、坚振礼、忏悔礼、圣餐礼、终敷礼、婚礼、授职礼。由此可见,人的一生一切重大事件几乎均被基督教会宗教仪式所囊括,人们进行文学创作势必彰显教会文化。独具风格的教会节日、活动,比如祈祷、弥撒、法场等崇拜礼仪活动,则直接成为当时文学传唱最广

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仲夏节是为纪念施洗者约翰,冬至日则纪念圣女露西亚,万圣节则纪念所有死去的圣徒,圣诞节是为纪念耶稣诞生,情人节为纪念圣瓦伦丁神父,一到这些宗教日,盛大的庆祝活动势必让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情愫得到最大程度地自由传唱,也激发了作家对教会题材的青睐。

丰子恺先生在追忆弘一法师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艺术精神,正是宗教的。”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与宗教以不同的存在方式展示世界,但两者同属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范围,就本质而言,均是追求精神上的适意和满足,使人的心灵得到平衡与归宿。这让我想到中国古典文学巨著《西游记》中一句诗——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再反观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圣经》故事对西方神话、传说、史诗的影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基督教教义对文学作品中“人性”的渗透,又或者基督教中那些独具风格的教会节日、活动等对文学传唱方式的促进上看,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联姻”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1] 蒋承勇. 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83.
- [2] 崔建军. 西方文学与宗教神话原型[J]. 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4): 50.
- [3]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全集(第8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11.
- [4]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三联书店, 1989: 180.
- [5] 何云波. 终极价值的寻求[J]. 艺海, 1996, (3).

莱尔历史思想的基本观念,这是一种反社会发展的观念,因而反对那些“重评”之作热情地把他当成社会发展之“先知”的做法。

卡莱尔因其英雄史观而常常被狭隘地抨击为复古反动的代表,这样的看法显然过于片面武断,没有注意到、或是刻意忽略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环境,所幸的是这一观点已被逐渐修正。殷企平教授结合整个十九世纪的社会状况和思想运动,写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例如《卡莱尔“英雄”观的积极意义》《卡莱尔主义,还是基督教社会主义?——从〈奥尔顿·洛克〉中的麦凯之死说起》《走向平衡——卡莱尔文化观探幽》等;在他的《推敲“进步”话语》一书中,卡莱尔则成了他的代言人,成了一个“进步”话语的推敲者。这些研究与雷蒙德·威廉斯是一脉相承的。何艾莉在《托马斯·卡莱尔对“机械时代”的回应》中论述卡莱尔面对“机械时代”所追求的平衡发展的道路,陶家俊在《卡莱尔和阿诺德:自由-人文主义文化批判》一文中将卡莱尔与稍后的马修·阿诺德并举,论述了两人对英国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属于这一类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卡莱尔化身为十九世纪的文化批判者,作为那个充斥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机械主义、工业主义主流的时代的一个异类,他的思想无疑是一面值得令人反思的镜子。

还有一部分研究则着眼于卡莱尔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一方面是卡莱尔对中国文化学者的影响,如赵雨的《辜鸿铭与托

马斯·卡莱尔》,段怀清的《梅光迪对卡莱尔思想的解读阐释》;另一方面是卡莱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接受和吸收,如葛桂录教授的《托马斯·卡莱尔与中国文化》。

卡莱尔也是英国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之一。然而国内关于卡莱尔文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只能散见于一些大型著作的片言只语中。这一研究领域在国内的贫瘠状况,一方面是由于第一手研究资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卡莱尔历史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研究局面亟待扭转,从而不免忽略了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因此,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填补。

当然,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既不能脱离他的整体思想脉络,也不能局限于诸如英雄史观、神秘主义、文化批判之类的教条框架,因为文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卡莱尔面对文学的态度同样充满矛盾,韦勒克将其生动地形容为“处于学术史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

【参考文献】

- [1] Richard Garnett, Life of Thomas Carlyle[M]. London: Walter Scott, 1887.
- [2] 雷纳·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三卷[M]. 杨自伍,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3] 陈文海. 激扬华章下的恒流与变异——关于卡莱尔及其历史观念[J]. 学术研究, 2007, (4).